



社 科 学 术 文 库

LIBRARY OF
ACADEMIC WORKS OF
SOCIAL SCIENCES

金春峰◎著

汉代思想史

(增补第三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科 学 术 文 库

LIBRARY OF
ACADEMIC WORKS OF
SOCIAL SCIENCES

金春峰◎著

汉代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代思想史/金春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4 (2006. 2 修订第 3 版)

(社科学术文库)

ISBN 7-5004-2053-6

I. 汉… II. 金… III. 思想史—中国—汉代 IV. B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5413 号

策划编辑 陈 彪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010—64031534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2 月修订第 3 版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毫米 1/16

印 张 36.5

插 页 2

字 数 558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修订增补第三版序

——汉代经学哲学的产生与特点

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其灵魂或指导思想，必定是哲学。汉代，居思想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是经学。那么，它有无哲学思想？其哲学思想的性质与特征为何？是许多朋友常常提出的问题。下面试把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作一简述。这些看法在本书各有关章节中已经做了论述，这里只是让它更集中、简明。也以此作为第三版的序言。

一 时代的新问题与需要

以往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认为汉人讲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或者是神学的讲法，或者是具体经验的讲法，故只有宗教神学与科学，没有哲学。本书认为，汉人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并成功地以之指导社会，解决了当时社会、国家面临的时代性的大问题。哲学虽然是人的精神与思想自由与自由运思之产物；但社会与政治的需要，常常是刺激其产生的力量与催生剂。汉代哲学——作为支配性的经学哲学，更是如此。

汉代哲学的中心或主题，用汉武帝及董仲舒《天人三策》的话来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是讲天人关系；“通古今之变”是讲古今关系，两者都是具整体性、普遍性——即世界观的大问题。天人关系本来是先秦以来各家哲学所讲的问题。孔、孟、荀、《易》、老、庄，其思想体系可以说莫不以天人关系为中心；“通古今之变”亦是如此，而法家尤具代表性。这两大问题在武帝即位时，都有其新的时代尖锐性、迫切性。哲学如果不想脱离生

活，不想成为僵死无力的教条，就必须回答这两大问题。而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哲学正是在成功地解决这两大问题中建立起来的。它如此成功，以致支配了汉代整整四百年的时间，成为此时期学术、政治、社会伦理道德的指导思想。

就天人关系言，汉初所呈现的是一种新的危机，其集中表现是：

（一）信仰的失落；

（二）人的失落，人的尊严与地位的丧失。

殷周有传统的上帝与天命信仰。王权的圣神性与合法性都建立于这一神权、天命之上。经过春秋以来理性的发展，文化的提升，人文思想的涌现，系统性哲学思想的诞生，上帝、天命信仰被严重打击、毁坏。

孔子制礼作乐，维护传统信仰，并把它理性化而引向人文与道德教育的方向，为中国文化树立真正新的基础；同时为人的尊严与地位，从天人关系的哲学高度，提供有力的论证。但儒家思想在孟子以后迅速遭到削弱、围攻，郁而不彰。孔子死后，儒分为八。荀子在战国末期，成为儒学代表，但荀子的“天道”观，摈弃传统，摈弃信仰，建立在道家自然论基础上。其礼乐文教、道德伦理思想，以人性恶为前提；彰显与突出了“理性”的作用。按荀子的学说：人之能成为人，依赖于圣王的“化性起伪”。人成为完全被动的受教育与改造者。法家源于黄老刑名，视人为一自然物。当韩非把它运用到政治领域时，认为对人的统治，一如对牛马的驾驭，仅须赏罚两手。人的尊严与地位彻底丧失。汉初流行的《黄老帛书》对人的看法，即是这种思想。“夫民之生也，规规生食与继。不会（交配）不继，无与守地；不食不人，无与守天。”（《十六经·观》）人的主要特征和任务，被认为是生育和提供衣食。对人的统治也只需刑德两手。所以，在汉初代初期，文化道德的危机，其性质和根源，不是贵族腐化堕落的问题，而是指导思想、哲学思想的问题，而其核心即是天人关系中所蕴涵的对人的看法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一切都不可能走上正轨。

就古今之变言，它的尖锐性表现为：新的官僚制的中央集权建立了，种种人际关系、政治关系，如君臣关系，臣民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等，必须有新的思想予以规范；而旧的包括孔孟在内的传统

学说、思想以及秦人奉行的法家思想，或者过时了，或者失败了，都不能适应新的政治需要。

孔孟的政治伦理学说是适应宗法分封制亲亲的诸侯国家这种情况的。孔子讲“正名”，讲“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讲“子欲善而民善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庶人不议”。孟子讲“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推恩足以保四海”，等等，都是以宗法亲亲制的国家制度为基础的。士与诸侯的关系，也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自愿帮忙、帮办的关系。新的大一统皇朝建立后，天子居至尊无上的地位，并掌握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权力。君臣关系，中央地方关系，完全是政治关系。“亲亲”情恩的原则已不能成为关系的基础。法家完全排斥宗法仁恩，而一律诉诸于法。实践证明，是不适合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那么，仁恩宗法与法令、法治如何协调、兼顾、平衡？“君”“臣”“民”三者的关系何以“定位”？如何建立适当的关系？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具体如何规范？如何吸收融合先秦各家思想，特别是在社会和政治领域拥有重大影响与势力的阴阳家思想，建构新的思想理论，以符合新政治形势的需要，成为时代的迫切问题。董仲舒建立的新经学哲学就是适应这一时代任务而出现的。

二 经学哲学的基本性质与内容

董仲舒建立的哲学体系，称为经学哲学，因为在其答武帝诏问的《天人三策》（见《汉书·董仲舒传》）中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接受了。儒家的五部经典：《诗》《书》《易》《礼》《春秋》，从此成为官学——太学博士生员的基本教材，成为社会、政治、人伦、道德与天人关系的根本指导思想，有如《圣经》《可兰经》《佛经》之称为经，这五部著作也成了五部经书。《圣经》《可兰经》《佛经》称为经，在于解决人生之价值与归宿问题。《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则不仅解决这一问题，还政教合一，解决国家政治之根本方针问题，是所有企图进身官僚统治阶层的人所必须修习掌握的。

汉代经学，后人特别是清人，称之为汉学，以为其性质、内容是

名物训诂。实际上，它的主要特质与特征，是义理之学与哲学，主要是哲学。这个哲学的根本内容是天人关系、古今关系，而核心是重新树立天的权威与信仰，重新确立人的尊严与地位，重新综合已往的政治与历史之经验教训，以确立适应大一统中央集权之新的政治与社会之需要的新指导思想。

战国后期，天人关系，盛行的是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与邹衍的终始五德思想。在《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中，它与人君的起居饮食及施政及人们的生产生活及祭祀民俗结为一体，而以神秘的天人感应为核心。秦朝的统治者信奉这一学说，汉朝的统治者也信奉这一学说。而因其与占星术相结合，与天文时律历法相结合，并成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在民间亦享有巨大的影响与力量，因此是任何一个企图居于主导地位的新哲学所必须面对、认真吸收与消化的。由于秦的“焚书坑儒”，易学在秦汉、汉初特别流行。马王堆帛书中，除《老子》《经法》等黄老著作，《周易》及《易传》《易》说资料是最有分量的部分。“《易》以道阴阳。”所以阴阳家与儒家在秦汉之际这一时期，可以说早已合流了。董的哲学以阴阳五行为基础，是由这些情况决定的。

但董的思想体系并非简单地继承与照搬阴阳五行，而是将这一学说的精神与关注点，由神学的以吉凶祸福为内容的天人感应，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道德目的论和人文主义思想。在古今之变上，则以《公羊春秋》学为基本的指导方针，古为今用，有如司马迁引董仲舒所说：“《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有国有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知，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汉书·司马迁传》）实际上使春秋学演变为解决当时政治、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指导著作。

董的思想体系，以阴阳五行为基础，吸收法家、墨家、名家、道家黄老思想，形成综合与扬弃各家的一大思想体系，在整个汉代四百年间，覆盖与支配了《易》学、《诗》学、《尚书》学等各学术思想

领域，成为一时代性的思想与思潮。没有这一体系的建立，仅靠政治的力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绝不可能成功的。

三 儒家人文思想的重新确立

董的哲学，就其核心价值与精神而言，乃一道德目的论的哲学思想。它集中表现于下列命题：

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又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万物者，莫贵于人。（《人副天数》）

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

等等。就是说，人，只有人是目的，其他万物以及阴阳五行的运行，或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或是体现一关爱人的精神。由此确立起“天地之性人为贵”（《汉书董仲舒传》）的思想。而人之贵，则在于其仁义道德，所谓“天生之以孝弟，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汉书·董仲舒传》）不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恢复了孔孟人为贵的人文传统；而且以开阔的胸怀与远大的视野，综合各家特别是有势力的阴阳家思想，予以消化，而重新树立起儒家人文思想的权威与独尊的地位。

这里，“人为贵”指的是人的“类”或作为“类”的人，而不是个人，也可以说，这里的“人”是一集体名词。因此它并非个人尊严或与人权有关的思想，把它现代化是不对的；但在古代，在董仲舒的时代，这仍然是与人的幸福、利益密切相关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董指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立王以为民也，故德足以安乐民者，天子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深察名号》）“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

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天人三策》）强调君民一体，君的职责不在于赏罚与统治，而是教化：“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故君民者，贵孝弟而好礼义，重仁廉而轻财利……故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谓也。”（《为人者天》）因此，有一系列的转变。董的“立太学”、兴教育、举贤良、“除奴婢”、“去专杀之威”、“开放盐铁”、政府不与民争利及主张禅让、革命，等等；这些在当时居于时代前列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可以说都是在这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提出的。它被确立为指导思想，从而使汉代思想在经过战国至秦汉长时期的儒学衰落和混乱以后，能又一次确立起人文思想的大方向、并使儒学传统得以承传不断。

由此，阴阳五行的所谓气化论宇宙图式在董的体系中被改变了性质，成为由上述目的所支配的思想，所谓“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王道通三》）。“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同上）“仁，天心。”（《俞序》）阴阳五行的有规律的运行成为道德化的自然，或蕴涵道德的自然，其全部运行皆为仁——对人的爱所支配，从而保证了宇宙的和谐，使万物生长收藏，生生不息，而人得以有其和乐的生活。“天地之行美也，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显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阴阳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也，见其光所以为明也。”（《天地之行》）天，它高高在上，显得极为尊严；但它下施雨露，使万物畅顺生长，充满着对人的仁爱。它无形无象，有光亮照耀，使大地光明。一切都体现出道德的目的。

故不能因为未讲孟子式的心学，就否定其为儒学与儒学的新发展。

不能因为未讲柏拉图式的理型论思想，就否认其为哲学思想。它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思想是同类的，而更具鲜明的人文思想特征。

可以设想，在汉代前期这样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在孔孟心性论与强调宗法血缘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的框子内打转儿，儒家思想是不可能有其活力、生命力的，更遑论其可以“罢黜百家”而使儒学独尊，建立起大汉一代的完整而全面的新经学，而真正成为社会文化、学术

与政治的指导思想了。

四 汉代经学哲学与政治

经学哲学，在汉代，它的基本性格是政治的，主要特点是：

（一）经学哲学本身是政治的。政治性是其最本质、最根本的特性。它是政治的指导思想。与政治的内在结合、政教合一，是汉代经学哲学成功的政治基础。汉武帝对董《天人三策》的重视、采纳，是经学确立的决定性条件。

（二）经学哲学——被视为大经大法，普遍、永恒真理。它对各部门学术之指导与统帅性，是经学哲学的又一特性。故在汉代，不论《易》、《诗》、《书》、《礼》，都由统一的经学哲学所指导。因此《诗》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以“三百篇当谏书”。《春秋》不是历史记事，而是“礼义之大宗”。《易》不是占卜术与普通哲学，而是天道，天人之道的根本。对经学的研究不是学术考证，名物训诂，而是为政治、为伦理道德服务。经学哲学作为载道卫道的著作，道德、教化性是其本质的根本的特性。“罢黜百家”，是它的内在要求。

（三）经书本身的神圣化，被神化为神书，是经学成为经学的必要条件。故在汉代，孔子被认为是素王，受有天命，为汉制法。没有这一条件，经书本身不能超出于其他学术典籍之上，不能具有永恒性与指导意义。故“名号以达天意”，“观五行之本末顺逆，所以观天意也”，成为它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以后，孔子更被神化而有谶纬的出现。但这种通过诠释以建立经学的企图，是成功的，又是不成功的。不成功，不仅因为《诗》《书》《易》《礼》《春秋》原本不是“天书”、“神书”，孔子原本不是神，也因为即便成为“经”以后，对它的阐释仍是多元的、异义的，无法消弭其学术性、人间性。虽然皇帝跻身经学，成为经学的最高权威，宣帝有石渠阁会议，裁决经义，东汉有白虎观会议，《白虎通》成为法典式的典籍，但经义的讨论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分歧、矛盾，始终不断，并终于成为促使经学走向瓦解和消亡的因素与力量。

（四）由于政权独尊儒学，立五经博士，到元成之际，宰辅、大臣皆为经学之士，一切政事以经义为准，经学之士成为新的士族与巨

大社会政治力量。巨大的土地资产、政治权势，门生故吏结成的经学帮派，及经学知识的垄断权，使这一群人成为社会之政治、经济、思想三位一体的中坚力量，新的社会主要基础。这种皇权与经学士族相互依存结合的情况，左右了西汉后期的政治变化。王莽，由士族拥戴而登位，又由士族的离心而垮台；东汉光武由士族拥戴而登位。灵献以后，亦终于由党锢之祸迫害士族而亦亡于士族。袁绍集团、曹魏集团及司马氏集团，都是士族或依附士族的。以后，又演变为晋以后的门阀世族，造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经学哲学之影响可谓空前矣！

（五）当汉代经学和谶纬合流，种种迷信荒诞思想盛行，思想界被弄得乌烟瘴气的时候，道家思想成为有力的清醒剂。扬雄以道入玄，造作《太玄》，企图取《周易》而代之；王充则自觉地以黄老之自然观为哲学基础，发展出批判神学与崇尚实知、知实的理性思想。郑玄引老注《易》，引进自生、自长、自养、无为的思想范畴，开王弼以老注《易》的先河。汉末的批判思潮也与道家思想相互呼应，终于在魏晋，发展出以王弼为首的新思想，由道家占居统治地位，而结束了汉代经学哲学。

本版最后一章论经学哲学的终结，增加了许慎《说文解字》、《五经异义》与郑玄遍注群经三节，使两汉经学哲学的终结过程，得到更完整的阐述。

本书顺利出版，张树相总编和二编室陈彪编审及有关同志付出了大量辛劳与心力，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

金春峰 2005 年 4 月 15 日

稿于台湾礁溪佛光大学

修订增补版序

1990年，来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访问，1991年，接到剑桥一位学者来信，他正在研究中国汉代思想，要求寄赠或代买拙著《汉代思想史》，说是一位台湾教授向他推荐的。1994年又接到老同学高宣扬教授来信，说在东吴大学兼课讲汉代思想史的一位教授告诉他，讲课时采用的教材是我的《汉代思想史》。1995年上半年，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李增教授来普大访问，他说暑假将为辅仁大学汉代思想史博士班讲课，决定采用我的《汉代思想史》作教材，向我索要两本。一本我请他审阅，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一本他说供学生复印、阅读。这边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系主任彼得森先生也推荐这本著作给他的一位研究汉代文化思想的博士研究生作为参考书阅读。想到这本著作能为青年学生的成长贡献一点绵薄之力，内心十分欣慰，也得到了最大的鞭策和鼓励的力量。所以我就把它修订重版了。

全书基本上保持原样，但增加了两章，一是孟喜京房的易学，一是刘歆与西汉正统经学的结局。后一章主要讨论刘歆的经学思想，也提到了《周官》。《周官》在王莽当政时，成为显学，引起人们重视；亦与学界所谓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斗争直接相关。本章的内容，除论述《周官》成书的时代，亦对汉代是否有今古文两学派的对立与西汉经学的政治化所导致的恶果，做了论述。这对于了解西汉末年思想的趋向是有意义的。关于孟喜京房易学的基本内容，过去已出版的著作，特别是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史》，有详尽论述。我增写的孟喜易学这一章，参阅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主要是补充和提出了我的一些新的看法，即：孟喜易学是董仲舒阴阳五行思想在易学中的推广与运用，因而是西汉董仲舒建立的今文经学之阴阳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京房易学是在孟喜易的基础上建立的，其基本贡献是在使

全部“周易”包括卦的排列及每卦卦义的解释都以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予以统一的解释，从而使全部“周易”阴阳化，凸显了“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易”的基本主题。飞伏、互体、卦变这几种阴阳互变以解释“易”的义理的方法的提出，则为汉易的象数之学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故由于这两章的增加，西汉的思想与学术的全貌，就更为全面而完整了。

本书能够重版，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郑文林先生和黄德志女士热心推动和促进的结果。在“出版即是赔钱”的情况下，他们却仍愿意赔钱以支持本书的修订重版，这份为繁荣文化学术而尽心尽意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对我个人是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借此重版之际，谨表达对他们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全体同仁的衷心的感谢。

金春峰

1996年5月25日定稿

序

丁伟志

对于金春峰同志，我是先识其文，后识其人的。但这中间并没有多长的间隔，读过他的一篇论文之后，就急于识荆了。这大约是1980年夏秋间事。

我一向固执地认为，文章既是写给人看的，那就必须动人。不管是动之以理、以事、以情、以辞，还是以什么别的，反正要能打动入。如果把话说绝，那我是宁肯去读激人动气之作，也不愿意咀嚼那种淡而无味、过后连点渣滓都剩不下的东西。

五年前初读金春峰同志论董仲舒之作而有所感者，就是一下子被他拨动了心弦。

我于董仲舒，从无专门研究，况且大难之后，学事荒疏，在我的头脑里，有关董仲舒的，大体上也只残存些“天不变道亦不变”、“三年不窥园”之类，对于金春峰同志的专论，何敢妄议短长。但是我毕竟作为一个读者，而有动于衷了。动，当然首先就是为他提出董仲舒思想在西汉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的大胆论断所动。浅薄之如我，在未对董仲舒进行独立研究之前，自然不能也不想贸然把自己划归此论的支持者或反对者的行列中去，这正像后来看到对此论持异议的论文时也不敢贸然表示赞成或反对一样。不过，我的态度也有明朗之处，那就是支持对这样性质的学术问题，进行公开的平等的讨论。当然这也算得上是一种倾向了，即倾向于不赞成禁止这种讨论。坦白地说，这几年我对于重要的学术问题，确有唯恐天下不“争”的心情，这大约就像足球比赛的热心观众那样，绝不希望看到的仅是一支球队在没有任何对手的情况下大踢空门。

至于何以会觉得董仲舒思想在历史上是否起过积极作用的问题，

是一个应当允许讨论而且值得讨论的问题，这倒是和自己积年的思虑有关。年轻时节，学习诸大师整理分析中国思想史的煌煌巨编，服膺而步履趋之。可是时日稍久，又不免对流行论述产生了不甚满足的窃念。时有所思，渐渐地积淀成疑。我的疑问在于：悠久丰满、多姿多彩的中国思想史，为什么在有些学者手上，却状若枰上棋子，黑白分明，呈现为色调简单的图象？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把历史一旦划分成或长或短的若干段落之后，在每一段落上居然准有分别统率相互对立之营垒的思想家出现，并且是那样冰炭不容而又旗鼓相当？我曾经胡思乱想：西汉东汉，幸而都算是刘汉天下，得以划成一代，倘若分成两个朝代，麻烦可就不小，王充岂不就不能和董仲舒捉对儿厮杀了吗？这当然是故作戏言，但认真地讲，我们思想史的研究中，恐怕也不能说没有人竭精殚思地为某一时代的某一营垒“发掘”与“培养”主帅的事。历史上某位在世无大作为、身后湮没无闻、学术思想又无甚建树的平庸之辈，经我们的研究者之手“提拔”起来，从而雄踞思想史上显赫地位的事例，也的确可以举出几个来。就拿学术史上的大匠巨擘来说吧，往往也会把他们的思想加以“净化”，或贬抑而诟詈，或推崇而颂歌。善则纯善，恶则纯恶，而且似乎都是禀性天成，一成不变。意识形态领域中事，本是很复杂的，抹煞内在矛盾，剔除一切“杂质”，明快固然明快了，漏洞往往也就更显露出来。赫赫之如孔子，虽曾被尊到至圣先师的地位上，不是也并没有掩盖得住其思想中固有的某些理论混杂和逻辑紊乱吗？不错，我们容或也借诸“朴素性”之衣衫、“局限性”之靴帽，对某些古人的思想稍事缀饰，以求平抑溢美过甚的调门。这样做得好的，当然不乏其例，可是多数似乎并不太成功，常常叫人觉得像是勉强打上了几块补丁。

人物记传，自是治史的一种方法、一种体裁，有它存在的价值和长处。对于重大思想家进行专题研究，当然也是值得称道的，无可厚非。不过，对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即把思想作为发展过程拿来进行历史的研究这样性质的课题来说，恐怕就不是记传体所能胜任的了。所以，我每当读到中外哲学史著作时，回萦于脑际的一个问题就是：仅仅以人物为单位，去做简单化的“批”和“捧”的品评，难道能够算是研究思想史的科学方法吗？

还是在“文革”之前，我就带着诸如此类的模模糊糊的一些疑问和念头，仰望于从事思想史研究的诸师友，盼着他们的研究工作能够突破鉴定式人物述评的樊篱，把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真正变成思想史的研究。也就是说，我希望研究者们能把眼光从人物品评、排队上移开一点，转向着重研究思潮的来龙去脉、跌宕起伏。这样，当然就需要具体而深入地研究各种思想流派（不管是同时的还是不同时的）之间和各个思想流派之内的种种关系的产生，纠葛，分合，冲突，演化与消逝，具体而深入地探讨历史上各种思潮的成因、演变及其对后世思潮的影响，并且从各种角度来观察和衡量它在历史上所起的各种实际作用。经过这样一些工作，也许就能够不再囿困于那种学案式或评传式的格局中，真正写出新型的科学的中国的思想史来，从而把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高度。当然这不是一件举手投足间便可成功的事，它需要进行多次尝试，冒一些失败的风险。作为进行这样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批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敢于带头打破旧模式的“求索”志士。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金春峰同志为学的精神，和他当年写董仲舒论文时所显露的风格，是一致的。正因此，往日生机盎然的株苗，如今已长成枝叶茂密的乔木。一部《汉代思想史》终于大功告成了。尽管它还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摆脱习惯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尽管它还包含着若干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是它在我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不失为是一次有意义的新尝试，是一次富有启发性的新探索。

惭愧的是，几年来我于汉代思潮的认识，一无长进。承命作序，愈加惶恐。将就成文，也仍如当年一样，没有资格评论此书的得失。不过聊以解嘲的是，还是像当年那样，我仍然抱着支持一家之言的态度。况且我的确为这样一部从新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思潮演变的著作得以问世，而欢欣雀跃。我祝贺它的诞生，更预期它的诞生能引起关于汉代思想史的更深入的研究。

1985年6月25日于北京西郊

序

李泽厚

金春峰同志要我为这本书写序，我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愿意写这个序。

之所以愿意，原因之一大概由于这本书对汉代思想的一些基本看法与自己的观点不约而同，大体接近。当然，也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例如，我对《淮南子》的评价很高，老金却恰好相反：评价甚低。

大家都承认，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但几十年来对汉代思想却研究得很少。徐复观有三本《两汉思想史》的论著，大陆学人很少见到。徐书有好些可取之处。它对汉代专制政权摧残知识分子详加发掘，大书特书，证明文字狱由来已久，为前人所未道或语焉不详者；但由于这些论证似乎总有某种另外因素蕴藏其中，就不免显得片面或偏颇。特别是对汉代作为绵延数百年的统一大帝国在思想史上投影的积极方面重视太不够了——而这，毕竟是事情的主要方面。

不是吗？中华民族之有今天，10亿人口，广大疆域，共同文化……难道不正是由汉代奠定其稳固基础的吗？物质文明是这样，精神文明方面，例如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不也是基本形成在这个时期吗？所以我不同意大多数哲学史著作对汉代主流思想低估轻视、一笔带过或横加抹煞的流行看法，便写了篇《秦汉思想简议》发表了。

但我那篇文章是一种粗线条的轮廓勾画，非常粗糙简略；虽然自己还想继续做些过细的探究，但看来如同想做别的过细研究一样，是不大可能了。如今看到春峰同志开始做我想做而未能做的工作，并且